

理性选择与道德判断

—第三种文化的视角

汪丁丁

(北京大学 经济学系, 北京 100001)

摘要: 我的基本观点是, 一方面是情境理性和不断作出判断的道德的对立统一, 另一方面是进行符号交往的不断重复自身的自我与社会认知的对立统一。这两种对立统一便构成第三种文化的视角。

关键词: 理性选择; 道德判断; 第三种文化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划分的话, 一般地我们可以清楚地区分两种文化, 即自然科学语境中的文化与人文科学语境中的文化。现在人们尝试提出第三种文化的概念, 在这种论域里涉及理性选择与道德判断。90年代以前, 人们往往倾向于把理性选择与道德判断截然分开。但是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 康德所提出的作为主体自足的纯粹理性概念就已经遭到了知识界的挑战, 到了1994年, 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在其英译本《后形而上学的思考》一书中提出对理性的新的定义, 即理性必须被放置在一定的情境里才是有意义的, 它具有场景依赖性因而可以被称为情境理性。与此同时, 道德的概念也开始背离康德所框定的范围, 在哈耶克等哲学家的影响下, 道德不再是一套神圣秩序的现实化, 而是在历史的具体展开过程中不断演化和发展的。达尔文据此认为动物的道德与人类的道德是一个连贯的存在之链, 中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概括地讲, 理性根植于场景, 使得这种情境理性依赖于场景习得的各种恰当方式, 意味着理性与道德是纠葛在一起而无法判然两分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出两个问题。一是理性是如何依赖于情境的, 二是道德是如何演化的。

我的基本观点是, 一方面是情境理性和不断作出判断的道德的对立统一, 另一方面是进行符号交往的不断重复自身的自我与社会认知的对立统一。这两种对立统一便构成第三种文化的视角。显而易见, 第一种文化和第二种文化的方法存在冲突。自然科学家用数学逻辑语言建构他们的理论体系, 强调知识的严格性。沃伦斯坦在知识社会学的回顾中指出, 在19世纪的中期即1850年前后社会科学初步形成后, 以叙事语言为支撑的文学、历史学和哲学等学科便与以自然科学语言为支撑的人类学、法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发生内在紧张。这种紧张随着学院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演绎成为制度化的资源分配和瓜分利益。按照维特根斯坦在《伦理学讲义》中的分析, 能够说出的都是对于事实的陈述, 而话语一旦被说出便是一种基于对事实的领悟、直觉和体验基础之上的荒诞表述。但是人文话语的意义就内在于这种荒诞之中。不管如何尽量价值中立地通过语言去领悟事实, 主体已经先验地预设了意义体系。在事实与它所附着的意义之间, 并不存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一一对应的关系, 也没有波普所谓意义只能如此的事实。所有意义都是主体借助话语建构起来的, 事实的意义是被赋予的。第三种文化的主张者对事实和意义作了深刻反思, 同时也对科学和哲学的界限重新作了梳理,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 他们可以被认为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这种反思和梳理的结果就是知识界对意识本源、道德哲学和人生意义等问题有了一种崭新的视角。这就是第三种文化的视角。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进行衡量, 即使是最权威的《纽约时报》科学版也存在很多对人类经验的歪曲。

《自然》科学杂志已经连续发表数篇脑科学论文有力地驳斥了主流经济学的观念, 即认为理性选择与道德判断是泾渭分明的。依照休谟的分析, 事实与价值是分离的, 前者涉

及的是自然科学需要解决的实然问题，而后者是人文学者需要严肃对待的应然问题。两者具有严格的界限，是不能彼此混淆的，也就是说从事实中间是不能必然地引申出某种价值的。在这样一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科学家认为能够推导出一种不涉及道德的具有自身严格境域的主导理性选择模式。事实上，这只是一种科学的合理想象。既经不起实验经济学的挑战，也经不起现实经验的检验。尽管主流经济学界不愿意承认理性选择与道德判断有着暧昧的关联，但是实验经济学已经证明这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通过一个最简单的利益分配实验，实验经济学家就证明了人并不是纯粹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存在物，而是必须考虑分配方案的相对公平性。只有比较公平的方案，才能为双方接受。同时，经济学家选取现实社会的游牧民族、阿拉伯人、土著人等不同人群进行实验，得出的结果与实验室相差无几。因此，主流经济学家的科学叙事就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如果理性选择不考虑到道德、文化、习俗和传统的影响，而纯粹按照数学模型进行演绎和推理，就必然会产生系统性偏差。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实验经济学家史密斯通过一系列科学实验发现，人在作出选择时，根据医学原理划定的对理性选择起作用的脑区没有明显反应，而承担道德判断功能的脑区却显然被激活成为一个亮区。同时，他发现了人跟动物的一个重要差别就在于人脑中有一个承担他心想象力功能的镜像神经元。正是它在人处于2至5岁时发挥的作用使幼儿意识到别人是独立的自由意志，把别人看作被转换的自我。如此，人才可能形成社会意识和社会认知。

根据脑科学的研究报告，我们就可以知道个体在作出道德判断时，作为自我意识的道德主体和作为他心想象力的社会认知的两个标志性脑区同时处于被激活的状态。并且对于认识人类的理性与道德极有价值的场景记忆区域也被发现了。场景记忆与情境记忆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但又是人类独有的记忆能力，而后者更多地被赋予了人化或者说文化的色彩。其实质是一种能够让主体通过某些场景的触发能够在情绪体验中回到过去的心理状态中，引发一种亲切、温暖而深刻的对于时间的感受。在场景记忆的长期演化过程中产生了与之相对应的语义记忆。语义记忆是认知主体通过符号记忆确认或者重新熟悉社会、行为和语法规则的过程，它更多的是一种符号的客观处理机制而祛除了对于时间的感觉。可以说场景记忆是历史性的展现和回溯，而语义记忆则是瞬间性的确定和指认。那么，显然，人在进行道德判断时必须依赖场景记忆，而依赖场景记忆则自然地是个体的情感被卷入。也就是说，价值中立是不可能实现的。

科学家通过对人脑的仔细分析，发现人脑中存在着一种可以被命名为社会脑的区域。这个社会脑区域包括他心想象力和自我认知、社会认知和判断、面部表情想象等三个基本功能。在个体进行理性选择和道德判断时，社会脑就会处于兴奋状态，积极参与上述行为。与此同时，科学家发现如果个体被排斥在社会系统之外，那么他因为孤独、情感波动等状态导致的脑部活动区域与因为受到物理刺激产生疼痛而形成的脑部活动区域是基本上一致的。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两大基本原则是理性选择与实证方法的结合。这种被夸张的经济学方法广泛地渗透进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和人类学等各种学科当中，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与情感无涉的理性选择模型正在成为各个学科研究的基本范式。新古典经济学可谓这种模式的集大成者。这种理性选择模式有着三个基本假设：一，假设不变的偏好；二，假设不变的约束—资源、技术手段和制度安排；三，假设行动者追求“最优”。但是这种理性主导模式从它被提出后便一直遭到来自社会各个群体的挑战。社群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和环境主义者等以道德哲学为根据批判这种主张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模型。他们普遍认为这种理性概念是原子式的，忽略了个体的自我感觉、知识结构和价值偏好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他们指责这种理性概念是男权偏见的而导致对女性的歧视；他们更认为这种理性观把自我看成与社会完全隔离的行为主体，无视自我的社会、文化和环境含义。基于这种挑战，当代经济学为了替传统的理性观进行辩解，他们提出了具有演化论色彩的社会生物学意义上的理性选择模式。这种理性选择模式修正了此前的假设，其提出的新的假设是：一，假设有限的工具理

性能力；二，假设不确定的生存环境；三，假设行为的目的是适应环境；四，在以上三种假设中，行为主体追求最高适存度；五，假设行为主体永远处在种群之间和个体之间的资源竞争之中。90年代以后，人们普遍认为只要具备这种模式的前三个基本假设，就可以形成一个海那？所谓的选择模型。依靠这个模型，不用进行理性审判，人们便会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愚蠢地遵从规则，其实质却是利益最大化的最理性的行为。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就可以很有力地为传统的沿袭提供一种合理性阐释。通过这种考察，我们发现在一个社会结构里道德建设或者说文化传承的必要性，否则社会就无法被有机整合而趋于瓦解。通过这两种理性选择模型比较，我们发现，虽然基于单子式的理性选择模型开始转变为生物竞争式的演化模型，但是后者仍然不能容忍理性选择必然要涉及的情感因素，与实验经济学的结果也不符合。可见这种模型未能超越休谟关于人类行为的三项基本原则。即人类行为是在内心的不可违逆的道德律令、自然的情感因素和趋利避害的功利准则的综合作用下产生的。

在对道德哲学的回顾中，我发现康德三大批判最薄弱的环节是判断力批判，但是判断力又是一个理解道德最关键的环节。判断是道德判断里最重要环节，与之密切相关的是理解。叔本华毕生的工作就是试图批判康德对判断力和理解力的认知上的失误。而若干年后的女性思想家阿伦特延续了这条批评的线索。那么，理性与道德为什么会纠缠不清呢？关键在于对判断的定义一直没有定论。叔本华认为判断是直觉和感悟性的，而理解一样地必须诉诸于直觉才能真正地抵达事物的本质。但是，如果判断完全是直觉型的审美和充满神秘色彩的叙事，那么作为一种共适和具有普世意义的学术就丧失了它赖以建立的根基。主流经济学家往往据此强调整理性，排斥直觉。但是，作为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的萨克尔却是主流中一个另类。他认为理性选择是企业家行为，其本质富有创造性，直接介入生存论式的未知世界的神秘诱惑之中，是人类本能的好奇性的冲动的外化。可惜此后很少有学者注意他的这种奇怪的论述。一直到了200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重新接续了萨克尔的传统，他把萨克尔定义的理性选择界定为创造性选择，而把主流经济学家所认可的理性选择界定为反应性选择。前者需要的不仅仅是理性计算，更加需要判断和理解。而后者往往依赖于计算。所以，需要对判断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认知作一个工作定义，才可能讨论理性选择与道德判断的关联。我认为判断就是注意力在预先建立的概念与当下的体验之间进行往复移动的过程，旨在把主体的体验归置到最恰当的概念或者说一组概念之中。我觉得这是第三种文化得以兴起的一个关键的立足点。而价值判断则是使体验恰当地归入概念体系，是一套内在于判断主体的准则。道德判断则是基于道德概念的价值判断。道德判断与社会认知存在内在的紧密相关性，它不可能脱离社会认知提供的经验性记忆。在第三种文化的视野里，社会认知同样是一个关键的概念。所谓社会认知，就是在给定的社会场景中，在给定主体的身体状态中，在给定的符号交往和知识表达体系中，主体对他人行为和自身行为的恰当性的道德判断。根据这个定义，显然社会认知因为要涉及场景记忆等元素而必然牵涉到情感因素。阿伦特与叔本华都倾向于把理解定义为充满生命力冲动的思想活动，而纯粹理性概念则是没有生命力显现的活动。哈耶克在《感觉的秩序》一书中认为理性就是刻画认知过程如何从感觉刺激建构心理图景。心智把刺激重新组织为个体对心智所感觉到的正在发生的现实变化的阐释。因此，理性实质上就是一套行动规则，个体习得这套规则后就会习惯性地将其转换成为脑神经元的标志理性功能的区域。所以，理性是一个长期积累和更新的过程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耶克是最早的提出演化的理性和演化的道德概念的学者，而且正是因为这种认识使他成为最早把理性与道德当作在历史进程中展开的行动规则。

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表明，人脑中确实存在一个承担社会认知的特定区域，这种区域支撑的社会认知有三个主要元素构成：场景依赖、身体依赖和符号交往。同时脑科学发现，人脑中存在一个他心想象力的区域，承担理解他人和判断环境的作用。史密斯教授在他的研究中指出场景依赖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无法用符号来进行表达的。因为作为行动规则的

理性是在生物演化的长期过程中形成和丰富其内涵的，理性永远是语义记忆和场景记忆正确结合的产物。如果语义与场景错误结合，就会被认为是疯狂的或者是白痴性的。因而是非理性的。正常人都是从包括法律、习俗、道德和模仿等各种内涵的社会生活中习得如何在不同的场景中作出恰当行为的。我们出于习惯而不是纯粹理性在给定场景中作出恰当行为。场景记忆与语义记忆的区别在于前者往往是人类自我意识与他心想象力共生演化的产物，实际上它们总是同时出现。人在进行创造性思维时自我意识、他心想象力与场景记忆往往是同时纠缠在一起发生作用。史密斯教授用生态理性来概括这种人类的经验理性以之区别于主流经济学家所推崇的经济学理性。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一书更是从理论和历史两个层面考察理性的概念，认为它决不可能是康德意义上的纯粹逻辑的思辨产物，而是必须被纳入社会历史来进行考量的生成性的范畴。当然哈贝马斯用的是更宽泛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范畴。这种合理性与人类选择巫术符号还是科学符号来进行知识表达密切相关。由此可见，社会交往和社会网络，是自我意识、生态理性和道德判断的最重要的发生学前提。社会理论的发展表明，人类基于安全欲求与效率欲求会建立机械的和有机的社会网络，在这种社会网络基点上建筑的社会理论证明了人类社会需要强利他主义者且需要以某种方式补偿强利他主义者。换言之，社会理性与社会道德是纠缠在一起的，人在作出选择和判断是不可能从中抽离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社会理论的概念应该是知感式的而不是纯粹的逻辑演绎，社会科学的建构应该以常识性知识为基础，才可能永葆它的生命力。总而言之，通过这一系列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理性选择与道德判断是纠缠与牵连在一起的一母同胎的孪生子，是社会历史发展中涌现的一个基本事实。

Rational Choice and Moral Judgement A Version of the third kind of Culture

Wang Ding-ding

(Peking University Economics Department, Beijing 100001)

Abstract: I think on one hand logos of environment and morality of judgement will get into agreement through conflict. On the other hand self which is intercoursing and repeating by symbol contents to recognition to society. The version of third culture is became of them.

Key Words: rational choice; moral judgement; the third kind of culture

收稿日期: 2005-03-12

作者简介: 汪丁丁, 男, 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博导。